



“文明的个体”：

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团体研究

张楠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文明的个体”：

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团体研究

张楠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的个体”: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团体研究/张楠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7

ISBN 978-7-309-13760-6

I. 文… II. 张… III. 英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I56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0259号

“文明的个体”: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团体研究

张楠著

责任编辑/唐敏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86-21-6511885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76千字

201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3760-6/I·1109

定价: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

文人雅士，闲逸之余，相聚一堂，谈天说地，庄谐杂陈，思想的撞击迸发出智慧的火花。这种情形，在中外文化史上都屡见不鲜。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正是在如此随意、非正式的聚会里，与友人交谈、辩论，阐述他对哲学、社会、文艺诸多问题的看法，流传后世，影响深远。中国文化史上，首推战国时期，除了王侯之外，还有“四君子”那样的政治家，礼贤下士，门客众多，带动了“百家争鸣”的一代风气。西汉枚乘的《七发》里，楚太子“玉体不安”，吴客去探望时，极尽铺陈、描摹之能事，历数音乐、美食、车马、宴游、狩猎和观潮等世上最具吸引力、最令人兴奋的事物，均未奏效。最后吴客提出，要聚天下之一流英才如老子、孔孟、庄周、杨朱、墨翟等人于一堂，“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听了“泫然汗出，霍然病已”。可见这种思想交流无穷的魅力。

不过，在阳盛阴衰的父系社会里，古代的这种聚会大多没有女性的参加，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柏拉图的《斐多篇》描写苏格拉底在狱中最后一次与前去看望的友人交谈，也要请人先将抱着孩子、哭哭啼啼的妻子瑟西琵送回家去，然后再开始探讨灵魂不死的题目。《会饮篇》里，众人开始谈话前，也在其中一位的提议下，先将到场的一位吹笛的女郎赶走，要她“进去跟别的女人待在一起”，然后才开始高谈

阔论。这些细节的描写，充分反映出古希腊社会重男轻女的风气。不过在《会饮篇》的谈话里，苏格拉底引用了他所服膺的一位名叫狄欧蒂玛的女祭司的话，说明爱的真谛，多少略微弥补了一下这种缺失。我国文化史上，从南北朝开始，文人的聚会渐渐开始容纳女性的参加，由此而至唐、宋、明三朝，便有了一些有关谢道韞、薛涛、鱼玄机、朝云和柳如是等“才女”与男性文人来往，甚至参加男士聚会的记载。不过这种参与还是凤毛麟角、零星断片，只能勉强说聊胜于无罢了。

这种重男轻女的情况，在西方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才有所改观。欧洲的文艺沙龙源起于16世纪的意大利。曼图雅侯爵夫人伊莎贝拉·德埃斯特(Isabella d'Este, 1474—1539)的府邸里，云集了当时最富盛名的诗人、艺术家，一代巨匠如贝里尼、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提香等人，都常在此聚会。浪漫派史诗《疯狂的奥兰多》的作者阿里奥斯托，称赞女主人“自由而气度恢弘”，外交家高雷奇奥更誉之为“世界第一夫人”。随后，出生于罗马的兰布莱侯爵夫人凯瑟琳·德·维冯(Catherine de Vivonne, 1588—1665)，将这种习俗带进了法国。自1607年起，一直到她去世，在她巴黎府邸中的“蓝室”(chambrebleue)里，法国的著名作家和诗人高乃依、拉封丹、马莱伯、圣阿芒等人，都到场参加她所主持的聚会。以她为代表的谈吐高雅的名门仕女，博得了“风雅才女”(les précieuses)的称号。不过在男性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这种称呼渐渐也成了“矫揉造作”的同义词，在喜剧大师莫里哀的笔下遭到无情的嘲弄。法文里的“沙龙”(salon)一词，源出意大利语(salone)，本义为豪宅里的前厅，从17世纪下半叶以后，此词开始盛行于西欧，取代了以前使用所在的各种特定的房间的名词，成为这种聚会的统一称号。

到了18世纪，这种风气终于也跨过了英吉利海峡。英国最有名的文艺沙龙的女主人伊丽莎白·蒙塔古(Elizabeth Montagu, 1720—1800)，其父是位风景画家。她嫁给商业巨子，日后又继承了丈夫的遗产，家业丰厚。不过与以前欧洲沙龙的女主人相比，她并非出身王

公贵胄。在 1750 年前后,她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蓝袜会”(Blue Stocking Society),以一些关心文艺和教育的妇女为主体,集会讨论文艺,后来也不时邀请男士参加。在她周围,先后聚集了萨拉·菲尔丁(Sarah Fielding, 1710—1768,著名小说家亨利·菲尔丁的妹妹)、伊丽莎白·卡特(Elizabeth Carter, 1717—1806)、安娜·利蒂希娅·巴鲍尔德(Anna Laetitia Barbauld, 1743—1825)、汉娜·摩尔(Hannah More, 1745—1833)、弗朗西丝·伯尼(Frances Burney, 1752—1840)等女性诗人和小说家。这种以女性为主的聚会,对于英国女权意识的觉醒和女性作家的崛起,有一定的影响。从 1770 年代起,蒙塔古夫人在伦敦希尔街的住宅和巴思的别墅两地,轮流主持聚会。文坛领袖约翰逊、肖像画大师雷诺兹、政论家埃德蒙·伯克、小说家霍勒斯·沃尔浦尔等人,都是她座中常客,可谓星光灿烂。

二

这种文艺沙龙的流风余韵,延伸进入 20 世纪之后,在英法两国的首都,有两处最为知名。跟以前西欧的沙龙相比,这两处沙龙里的女性,虽然并不一定像以前那样担任女主人的角色,却是聚会中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而且在智力和才华上同与会男士旗鼓相当。

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 1874—1946),1903 年迁居法国首都巴黎之后,在左岸卢森堡花园附近的住宅里,每个星期六晚间举行聚会。到这里谈天说地的客人,包括当时旅居或是游历西欧的美国第一流作家,如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庞德、辛克莱·路易士、舍伍德·安德森、桑顿·怀尔德等人,而欧洲方面的参加者则包括毕加索、马蒂斯、亨利·卢梭等先锋派欧洲大画家,以及法国诗人阿波里耐。参加这个聚会的人虽然不一定有什么统一的宗旨,但是他们对于突破传统、引领一代文学艺术的新潮流新风尚,还是有相当的影响。

至于伦敦的沙龙,当然就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了。和前两个世

纪的文艺沙龙相比,这个团体中,男士绝大多数出身剑桥大学,女士出身伦敦国王学院,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已经不是一介平民。他们从志同道合、聚会讨论开始“抱团”,随后其中的几位核心男女,缔结婚缘,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他们延续了二三十年的活动,在文艺上正值现代主义的兴起,在政治上则历经第一次欧战、苏俄建国、大萧条等重大历史变迁。个中人物,在思想方面多少又都受到分析派哲学家乔治·爱德华·摩尔的影响,极为重视人际思想交流的乐趣和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需求,将之视作社会进步的合理终极目的。他们的学术专攻涵盖了文学、艺术、经济、批评等诸多方面,彼此之间相互的影响自毋庸赘述,而且各自都多有著述,尤其是伍尔夫夫妇,还积极从事出版事业,将团体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严格说来,这个团体前后多年的活动,已经远远超越了历史上文化沙龙的范畴,更为深入地涉及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所构想的“公共领域”,对20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化发展史的影响,至为深广。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对于20世纪初现代主义崛起以后的英国作家如乔伊斯、劳伦斯、福斯特和伍尔夫等人的作品,有了较多的翻译介绍,但是迄今为止,在研究方面还是不够深入,对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研究,更是乏人问津。张楠撰写这部专著,可以说是在这方面填补空白之举,希望由此而能引起国内在不远的将来对于这个重要课题的更多研究。张楠专治现代英国文学,所以这部著作选择的角度还是以文学方面为主,此书前三章,集中分析该团体的灵魂人物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活动,并讨论其小说作品,其中包括分别在“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和“现代小说”的理论框架中细读其名著《奥兰多》《达洛维夫人》等作品;随后的第四章,挑中了很少为学界所注意的伦纳德·伍尔夫的两部小说来加以讨论;第五章论及团体中另一位重要人物、小说家福斯特的名著《霍华兹庄园》;随后的第六章,则将该团体的活动与影响放在“全球现代主义”的范围和背景中加以阐述。这样的选择别具匠心,角度也相当新颖。顺便提及,我于上世纪80年代初去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比较文学,前面几

年,曾经对于出国之前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有过浓厚的兴趣,先后以其长篇小说《到灯塔去》、《达洛维夫人》、《奥兰多》和短篇小说《公爵夫人与珠宝商》为题,分别写过四篇期末论文。每次在撰写动笔之前,我都充分利用了哈佛的怀登纳图书馆极为丰富的馆藏,对于相关的材料,做了一番“爬罗剔抉”的功夫,所以对于当时所能见到的有关研究文献,可以自诩还是比较熟悉的。这次拜读张楠的著作,发现她除了我当年所注意、使用的第二手资料之外,已经广泛涉猎、搜罗了最近这30年的有关新材料,显示了相当扎实的学术基础。

当然,对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以及其成员的研究,特别是就国内而言,还有许多尚未开发的空間。即以其核心人物弗吉尼亚·伍尔夫为例:虽然她的许多长篇小说向来为学界所注重,但是她的短篇小说,数量虽然不是很多,有的却也别具一格,相当出色,相对而言,就尚未受到足够的注意。她也是一位散文小品的高手,留下洋洋四卷散文作品,在自弗兰西斯·培根而下的悠长的英国散文传统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方面也还没有引起批评界的重视。此外,她还留下了大量的书信和日记,为研究者留下了一份丰富的宝藏。这些短篇小说、散文、书信和日记,除了大量的文本本身以及它们对于作为一位作家的伍尔夫的研究价值之外,对于进一步研究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活动,也提供了相当宝贵而丰富的资料。

另外,1827年,德国作家歌德在与爱克曼谈话时,首先提出了“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概念,指出这是文学打破语言、国界的藩篱,取代国别文学的未来趋向。正像张楠在此书第六章里所提到的那样,布鲁姆斯伯里的许多核心人物都具有世界主义的精神内涵,他们身体力行,突破传统的时代和地域限制,从这方面来说,他们也可以说是为歌德的“世界文学”理念在英国开疆拓土。团体中的中坚人物之一、《维多利亚女王传》的作者斯特雷奇,对于法国文学就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他早年的作品《法国文学的里程碑》是一部写得极为生动有趣的专著。他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两人都是杰出的书评家,

为英国著名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撰写了大量的书评。在他们的书评里，除了英国自莎士比亚以下的历代作家、作品之外，讨论所及，还包括西班牙的《堂吉珂德》和法国的拉伯雷、福楼拜、巴尔扎克、波德莱尔、马拉梅和瓦莱里。他们通过著名翻译家康斯坦丝·伽尼特（Constance Garnett, 1861—1946）的译本，阅读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通过翟理斯（Herbert A. Giles, 1845—1935）和韦利（Arthur Waley, 1889—1966）的译文，讨论中国的李太白、《聊斋志异》以及日本的《源氏物语》。他们对于“世界文学”的这种开放性的阅读、探讨和分析，与作为一个文化团体的布鲁姆斯伯里，又有什么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互动？

再者，若是从比较文学的课题来看，国外数十年来对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对于我们自己进一步深入研究民国时期的新月社、创造社、文学研究会等文化团体的活动和意义，会有什么样的启迪和帮助，又能提供什么样的崭新的角度和参照体系？凡此种种，都有待来日有心人的尝试和努力了。

三

在这里也说一下我跟此书作者张楠结识的经过。去国 16 年之后，我于 1998 年冬天重游故土，在谢希德先生和陆谷孙老师的安排下，回到母校外文系，在时任外文系系主任陆老师所主持的《白菜与国王》讲座系列中，作了一个英文演讲。我虽然已经在美定居多年，但是对于母校，尤其是对于为我提供了本科教育的复旦外文系，自有一份难以割舍的亲情。我曾经在好几个场合说过，我特别注重我们系名“外文”二字里的那个“文”字，因为当年复旦外文系的英文专业，从徐燕谋、林同济、杨岂深、刘德中、杨必等诸位先生，一直到与我有多年半师半友之谊的任志稷、陆谷孙两位老师，在英美文学教育上建立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这跟国内许多其他高校的外语学院偏重语言，忽略甚至轻视文学，在风格上是很不相同的。我衷心希望这

样一个传统在母校能够永远保持下去。

20年来,在前后三任院长陆老师和黄勇民、褚孝泉两位教授的热情安排下,我曾多次回到已经由系升级的外文学院讲课。2006年冬天我回国时,陆老师刚好在美国东岸与家人团聚度假,我临行前在与他通电话时,他说起张楠,跟我介绍了她本科毕业后工作数年又回复旦读研的经历,说她是难得的有自己的执着的好学生,要我回国期间安排跟她见面。事不凑巧,那年寒假,张楠恰好去印度旅游,我跟她失之交臂,不过此后通过陆老师搭桥,我们常有电邮联系。次年,她筹划申请出国深造,我根据自己在美二十余年求学和教学的经验 and 了解,对于她专业、系科、学校的选择,向她提供了一些建议,并且为她写了推荐信。再下一年(2008)的春天,我从加大休教研假,在老友勇民兄的安排下,在复旦英文系开了一门《诗与诗学》的研究生英文课程。已经行将结束硕士学业的张楠来课上旁听,我这才初次跟她见面,至今已有10年。不过据她告诉我,她第一次听我讲课,还是我初次回国时的那次,若是这么算来,那就也有整整20年的渊源了。也正是我们结识那一年的秋天,张楠顺利得到入学许可和奖学金,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英文系攻读博士学位。

时光荏苒,2015年春天,我再度休假回国。前此一年,张楠也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到母校任教。5月初,我应蒋洪新教授的邀请,第三度去湖南师范大学讲课。师大的外语学院是国内同业中少数重视文学教育的一家,承院长邓颖玲教授热心安排,我也邀了张楠同行,在师大的课堂上,聆听了她以《平凡一日的一颗平常心: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中的阅读与生活艺术》为题的讲座。她以流利的英语娓娓道来,不疾不徐,丝丝入扣,生动活泼,而且显示了条分缕析、驾驭丰富材料的能力,获得了在场师生听众的佳评。我为她学业有成、回国任教感到高兴,更为母校的英美文学教育后继有人感到欣慰。

张楠回国之后,精心讲课之余,笔耕不辍,已经在《外国文学评论》等中外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好几篇相当有分量的文章,这次又写成这部专著,成绩可喜。不过,正像美国诗人弗罗斯特那首脍炙人口的

小诗《雪夜林边驻足》里所说的：

树林可爱，黝黑又幽深，
但我仍有宿愿未偿，
入睡前尚须赶许多里程，
入睡前尚须赶许多里程。

张楠年纪还轻，前面的里程还很长，很长。希望她上下求索，再接再厉，在教学和研究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叶扬

2018年5月

于美国加州华山市猿影斋

目 录

序言	1
绪论 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团体 研究综述	1
第一章 弗吉尼亚·伍尔夫与“蓝莓”夜谭	11
谈话的艺术和心灵的契合	12
艺术创造与智识追求	19
“文明的个体”:沉思与行动	26
第二章 现代性与“自我塑造”: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成长	
小说	34
伍尔夫与布鲁姆斯伯里的启蒙理念	38
“自我塑造”概念:传统与现代性	51
“自我塑造”理想:从《远航》到《雅各的房间》和 《奥兰多》	59
第三章 个体德性与公共精神: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现代 小说”	76
“情感、礼仪和道德观念”	79
《达洛维夫人》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精神”	94

命运与德性的再造	109
第四章 伦纳德·伍尔夫的自由理念与政治志业	125
道德感与公益心	128
《丛林里的村落》.....	132
《智慧的处女们》.....	138
第五章 E. M. 福斯特的人文自由理想:《霍华兹庄园》	
的世界主义精神	143
“漂泊的文明”与无根世界主义.....	146
手段与目的:阿诺德式文化理想	156
“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有机体.....	162
结语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团体与全球现代主义	173
附录	177
参考文献	194

绪论 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 文化团体研究综述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学界最为关注的现代主义作家之一,也始终是国内外文学和文化批评中的一个热点。关于她的艺术创作和思想理念的专论层出不穷,研究视角和方法更是丰富多样。自从国际“弗吉尼亚·伍尔夫年会”(The Annual Conference on Virginia Woolf)2004年召开以“回归布鲁姆斯伯里”(Back to Bloomsbury)为主题的研讨会以来,英美学界围绕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这一英国现代文化史上最著名的智识团体展开了更加深入细致的探讨,为现代主义研究和文学批评开启了新的思路。回顾21世纪以来,英美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研究总体呈现以下几大主要特征:

一、结合对伍尔夫作品细腻微妙的语言形式及其创作的历史、社会语境的综合分析,更为系统地讨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文化思想主张和实践对伍尔夫创作的影响。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安·班菲尔德的著作《虚幻的桌子:伍尔夫、弗莱、罗素和现代主义的认知论》^①,可以说具有开创性意义。以往对伍尔夫的创作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关系的研究,往往侧重宏观描述这一团体的整体文化氛围

^① Ann Banfield, *The Phantom Table: Woolf, Fry, Russell and the Epistemology of Moder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和思想倾向,班菲尔德则深入到 G. E. 摩尔的《伦理学原理》、罗杰·弗莱的艺术批评理论和罗素的哲学理论等一系列深深影响了布鲁姆斯伯里成员思想发展的哲学文本的细微之处,剖析了伍尔夫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借鉴并发展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美学和哲学思想。班菲尔德的分析细致周密、鞭辟入里,既为现代主义研究提供了更为严谨的方法,也增加了对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研究的深度。

二、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探讨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思想和艺术实践。随着全球化的理论和批评话语的激增,以及跨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伍尔夫和现代主义的学者更加关注现代主义作品和创作的跨国性,从现代主义与 20 世纪初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的关系等角度在现代主义作品中挖掘新意。在这一研究框架下,对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解读与全球现代主义(Global Modernism)丰富的美学形式、文化内涵和政治意义密不可分。美国学者丽贝卡·渥克魏兹的《世界主义风格:跨越国界的现代主义》^①,是这一新的研究视角的代表作。她从伍尔夫、乔伊斯等现代主义作家的写作风格入手,汲取世界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分析思路,阐明了现代主义作家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和世界视野。丽莎·沙里阿里和吉娜·波茨新近共同编著的上下卷文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布鲁姆斯伯里》^②,收录了多篇论述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展现的有关国际视野和关怀的重要论文,包括加拿大著名伍尔夫学者梅尔巴·卡迪-基恩(Melba Cuddy-Keane)的《塑造世界:弗吉尼亚·伍尔夫及其友人的全球意识范式》(“World Modelling: Paradigms of Global Consciousness in and around Virginia Woolf”)和英国学者安娜·斯奈思(Anna Snaith)的《布鲁姆斯伯里的谈话:殖民作家们和霍加斯出版社》(“Conversations in Bloomsbury: Colonial Writers and

① Rebecca Walkowitz, *Cosmopolitan Style: Modernism beyond the N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Lisa Shahriari and Gina Potts. Ed. *Virginia Woolf's Bloomsbury*. 2 vol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the Hogarth Press”),等等。沙拉·布莱尔的《地方现代性、全球现代主义：布鲁姆斯伯里和文学的发生地》^①，则从都市空间学的角度论述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政治和文化实践既有赖于伦敦充满活力的文化空间，其文化触角和意义又突破了这一空间的地域局限性。

三、强调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文化批评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尤其关注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如何对待现代性发展中的一些核心议题，包括艺术创作如何参与公共生活，现代社会对文明的理解，以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等等。美国学者克里斯婷·弗鲁拉广被引用的专著《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先锋派：战争、文明和现代性》^②，深入分析了伍尔夫及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对康德启蒙理念的继承，以及他们在一战前后如何参与推动欧洲文明的进程，在学界影响深远。梅尔巴·卡迪-基恩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知识分子和公共领域》^③，以及爱丽丝·伍德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晚期文化批评：“岁月”、“三个基尼币”和“幕间”的生成》^④，均以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文化批评实践为背景展开分析。前者论述了伍尔夫如何通过文学评论、散文和论说文介入大众的审美教育，后者对伍尔夫晚期作品中的文化批评做了细致的梳理。

四、伍尔夫及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为探究现代主义与历史和传统的关系的重要切入点。作为反思现代性与历史传统关系的一个核心组成，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研究也是讨论现代主义中传承与创新关系的重要部分。雷蒙德·威廉姆斯的早期作品为这一角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安吉莉卡·斯皮罗普罗的《弗吉

① Sara Blair, “Local Modernity, Global Modernism: Bloomsbury and the Places of the Literary,” *ELH*. 71.3 (2004) 813-838.

② Christine Froula, *Virginia Woolf and the Bloomsbury Avant-garde: War, Civilization, Moder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③ Melba Cuddy-Keane, *Virginia Woolf, the Intellectual,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④ Alice Wood, *Virginia Woolf's Late Cultural Criticism: The Genesis of “The Years”, “Three Guineas” and “Between the Acts”* (London: Bloomsbury, 2013).

尼亚·伍尔夫、现代性和历史：与瓦尔特·本雅明同行》^①，以及伯里克利·刘易斯的《宗教体验和现代主义小说》^②，重新审视了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研究中把现代主义和标新立异等同起来的教条，从文学、社会、文化心理等多方位全面呈现了现代主义作品与历史传统更为复杂的关系。

随着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研究的不断深化，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知识分子如何看待和处理历史传统和现代意识的关系，持续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课题。然而，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对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包括现实主义在内的文学传统、道德风俗、社会科学思潮、工业化进程等问题的态度。有别于以往研究中将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和现代主义视为对立面、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看作所有传统的反叛者的简单二分法，近些年来的研究更显细致缜密和丰富周详。加拿大著名学者 S. P. 罗森鲍姆的《布鲁姆斯伯里面面观：现代英国文学和思想史研究》^③，还有史蒂夫·埃利斯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等颇具代表性的著作^④，深入分析了伍尔夫及其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同伴对传统和习俗既批判又欣赏的辩证态度。

然而，这一研究方法的局限在于割裂了英国思想传统本身的脉络，在此分析框架内，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和社会风貌显得静止和一成不变，而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评判对象，归根结底是一些教条化和模式化的社会习俗与价值体系。事实上，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核心成员的文学作品中始终贯穿着强烈的历史变迁感，尤其是从

① Angeliki Spiropoulou, *Virginia Woolf, Modernity and History: Constellations with Walter Benjami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② Pericles Lewis, *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the Modernist 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③ S. P. Rosenbaum, *Aspects of Bloomsbury: Studies in Modern English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8).

④ Steve Ellis, *Virginia Woolf and the Victori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